

纳粹德国缘何提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 杨晓杰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纳粹德国则是造成这场浩劫的元凶之一。按照希特勒制定的计划，他原本是准备在1943—1945年发动世界大战的，但战争却在1939年9月随着纳粹军队入侵波兰而全面爆发。希特勒缘何提前4—6年发动世界大战，弄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60多年前爆发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我们在今天新的世界形势下探讨如何遏止和避免新的世界战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量历史事实表明，希特勒提前发动世界大战，固然与他作为现代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冒险主义者和他所代表的德国最反动的垄断资产阶级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密切相关，但同时还有其它多方面的原因：绥靖政策是纳粹德国提前启动战争机器的加速器；反德国际统一战线的流产，形成了对纳粹德国有利而难得的战机；在战争准备上，出现了促使和刺激纳粹德国提前发动战争的顺利进展和有利态势等。本文拟就上述观点作一初步探析。

关键词：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图分类号：E10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2001)01—0118—131

我们知道，法西斯就是战争。法西斯德国为了实现其称霸欧洲乃至世界的野心，实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在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思想各个方面做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时，曾事先确定了一个较明确的发动战争的期限。按照希特勒1937年11月5日在一次高级军政官员会议上的说法，他着重考虑了“在1943—1945年”发动战争的问题，指出1943—1945年是他计划发动战争的日期^①。他说，这是他经过彻底的考虑和总结四年半多执政经验的结果，如果他一旦死亡，应看作他的“遗嘱”来执行。希特勒强调指出：在这个时期内，德国“陆、海、空军的装备以及军官的配备大体上完成了，物质装备和军火是新式的”，但是，“过了这个时期之后，情况只能变得对我们不利”^②，因为过了这个时期，武器会变得陈旧，“‘秘密武器’的秘密不能长久保存下去。”^③同时兵员难以补充，粮食危机严重，军费开支太大。更重要的是，英法不断加强军备建设，并采取各种措施对付德国，德国就会失去军事优势。然而，1939年

9月,德军大举入侵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全面爆发,显然,希特勒提前4—6年发动了世界大战。纳粹德国缘何以及如何提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呢?弄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它对我们在今天新的世界形势下探讨如何遏止和避免新的世界战争这一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绥靖政策是纳粹德国提前启动战争机器的加速器

德国法西斯战争罪魁希特勒,是现代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冒险者,冒险发动战争是他的阶级本性的突出表现。希特勒企图通过战争达到统治欧洲和世界的目的。他制定的侵略计划,我们从被称为纳粹扩张“蓝图”的《我的奋斗》一书,从1928年希特勒的《第二本书》,以及纳粹德国的一系列秘密指示、侵略方案和行动中,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阶段:首先,建立一个囊括中欧的“大德意志”作为核心。这主要是包括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和波兰的但泽走廊等有大量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其次,打败法国,消灭苏联,夺取欧洲大陆的霸权,以此作为称霸世界的基础;第三,向海外发展,战胜英美,称雄世界。一言以蔽之,就是“先大陆,后海洋”^④。不难看出,希特勒选择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全面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希望在这场战争中赢得完全的胜利。再简单地讲,德国法西斯进行侵略战争的目的,就是要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夺取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间”,最终统治欧洲以及世界。1938年8月22日,希特勒告诉他的主要军事指挥官说:“为了发动这场战争,我给宣传官员的理由是:不要问事情是否有理或无理,胜利者从不过问他是否讲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当开始进行一场战争时,不要管它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只要能胜利就够了。抛掉你们的同情心,勇敢地战斗!800万德国人民必须获得他们的权利(其中包括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人),他们的生存必须得到保证,强者就是正义的”^⑤。

然而,希特勒的巨大扩张野心同纳粹德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短时间内难以靠自己克服的矛盾和困难。一方面,德国的基本战略物资十分匮乏。德国除了煤、萤石、石墨、镁矿和作为肥料的矿石外,不论平时或战时,国民生产和人民生活必需的主要矿产和战略物资均不能自给自足。在30年代后期,德国又无法大幅度增加战略物资的进口,因为德国缺少外汇,使得实际进口额与希望达到的数量相差很远。另一方面,德国的军事实力同可能的对手相比也并不占据明显的优势。希特勒上台后,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着手扩军备战,但又面临着诸多难题:首先是兵源严重不足。按照纳粹德国的动员计划,1939年经过动员的野战部队应该达到103个师共210万人,但德国陆军现役和预备役军人实际只有不到190万人,结果只有征召没有受过训练的壮丁和参加过一战的年龄超过39岁的老兵来补充。其次是缺少受过专业训练的军官。到1939年,德国陆军中只有1/6的军官受过足够的军事训练^⑥。第三是武器装备和必要的弹药储备不足。例如按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要建立4个目的战争储备,但到1939年9月1日只达到如下的百分比:步枪子弹60%,轻步兵炮弹75%,重步兵炮弹65%,轻野战曲射炮弹60%,重野战曲射炮弹45%,

20MM 口径以上高射炮弹 70%^⑦。空军的炸弹储备只有 3 个月,航空汽油储备只够 2 个月使用。

战争史告诉我们,人员后备和物质资源潜力的大小对战争的结局影响极大。显然,纳粹德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无法保证其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条件下铤而走险这与希特勒的战争目标并不符合。作为德军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对现代军事并非毫无所知,更不会弱智到会犯常识性的战略错误。据德国将军 M·曼杜菲尔说,希特勒在军事上的能力并不像某些书上说的那样糟糕。“希特勒读过大量军事书籍,喜欢听各种军事问题讲授”^⑧。对希特勒而言。要想取得胜利,只有在战争准备上先走一步,争取出现并充分利用对其十分有利的战略形势和战机,即反侵略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且各大国消极避战求和等,以及其为发动侵略战争在前期进行的清障工作进展顺利这样一种态势,发动突然袭击,用闪击战去各个击破。英法在二战爆发前所推行的绥靖政策恰好在这方面满足了纳粹德国侵略扩张的需要。

历史事实表明,纳粹德国实行军事冒险、发动世界大战的重要前提就是英法等国绥靖主义分子的纵容。纳粹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勃洛姆堡在 1937 年 12 月曾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说:德国只有经过充分准备才发动战争。“但是如果由于英国害怕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于它对中欧事务的漠不关心,由于意法之间在地中海发生冲突而出现俄国之外没有人站在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来反对德国的局势,那么,在德国对战争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绿色计划》仍可以执行”^⑨。勃洛姆堡的这番话显然包含着相互关联着的两层含义:一是德国在形势对其有利的情况下,即使战争准备不充分,也会提前发动战争,并不绝对受限于原定的 1943—1945 年发动战争这一期限。二是德国认为所谓对其有利的形势是指英国“对中欧事务漠不关心”,即英国等国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

那么,英法等国实行的绥靖政策是如何鼓励并为纳粹德国提供可乘之机而最终导致纳粹德国提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呢?

首先,绥靖政策使纳粹德国“声东击西”手法获得成功,这进一步刺激了希特勒的扩张野心,加快了纳粹德国的战争准备进程。按照希特勒制定的“先大陆,后海洋”,先建立“大德意志”,继而独霸欧洲,最后称雄全球的三步曲,英、法是要被彻底解决掉的。在 1937 年 11 月 5 日德国高级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决定要在 1943—1945 年期间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谈到德国动武时“应当考虑到……英、法、俄及靠近它们的小国”,把英、法称为“两个可怕的敌人”,但是在德国战争准备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希特勒认为德国的首要任务是在保护日耳曼民族的幌子下,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中欧霸权,为下一步侵占整个欧洲大陆打下基础。“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对西方进行的战争中解除我们侧翼的威胁。”^⑩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出面全力制止德国的扩张活动,希特勒的扩张计划就会夭折。因此,排除英国对德国侵略行动的干涉,就成为这一阶段德国对英政策的重点。至于法国,希特勒认为,没有英国的支持,法国不可能干涉德国的行动,即使进行干涉,也很难取得成功。因此,在英法两国中,他的考虑重点是英

国。如何吃掉英国的盟友而又不招致英国的武力干预,希特勒决定,利用英法两国推行绥靖政策,力图“祸水东引”的企图,实行“声东击西”的策略,麻痹英法以掩盖他的真实目的。

希特勒在这方面的经验十分老到。1936 年 10 月,他就对来访的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说,他认为只要不断发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叫嚣,就可以把英国争取过来;英国不仅不会和德、意作战,而且会和德、意“取得协议和共同认识。”^⑪为此,希特勒每做出一个冒险动作,就要大叫一通“布尔什维克威胁”以麻痹英国,而英国首相张伯伦也和他相应呼应,配合默契,可谓心有“灵犀”^⑫。希特勒刚刚决定利用绥靖政策完成兼并奥地利、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时,张伯伦就不顾《凡尔赛和约》、圣日尔曼条约的有关保障奥地利独立的规定,公然派他的亲信、不管部大臣哈利法克斯到德国的伯希特斯加登去见希特勒,俩人一经密谋,便马上拍板成交。哈利法克斯对希特勒的反共叫嚣十分满意,连连称赞德国是“西方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屏障”,并吹捧希特勒在反共“事业”上“有很多的建树”^⑬。同时表示,只要德国向东方进军并使用“和平演进”的方式实现对奥地利的兼并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英国是不会表示异议的^⑭。希特勒则在会见后频频表示,他本人深为哈利法克斯的“异常诚恳、高度原则性和十分坦率所感动”^⑮。希特勒的满意之处说到底就是满意哈利法克斯同意他放手对中欧实行侵略。对于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英法认为这表明了德意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坚定态度,它们正可以借此把祸水东引,让侵略者的矛头指向东方的社会主义苏联,以避免自己置身战火。于是它们抛出了所谓的“不干涉”政策,放手让德意肆虐。希特勒对英法的用意自然是心知肚明,心领神会,所以,后来在 1937 年 11 月 5 日,希特勒十分明确地对戈林等人说:他“深信英国不会参战,同样不相信法国有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⑯他利用绥靖政策完成了兼并奥地利、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任务后,在着手进攻波兰的准备会上,希特勒又肯定地说:“英国不会对德国进行强有力的打击来击溃我们”,“任务在于孤立波兰,孤立波兰成功具有决定意义”^⑰。到最后决定对波兰作战时,希特勒仍认为“英法不会履行(援助波兰的)义务”^⑱。对于英德之间沆瀣一气的做法,当时充当英德勾结的主要人物的英驻德大使汉德逊也坦白承认:德国“和英国的美好关系只是意味着他(指希特勒——引者)要英国同意他重画中欧地图的计划。”^⑲

当然,德国的目的是要利用英国,是为了实现既定战略方针而做出的一种姿态或假像,并不会真的如张伯伦之流所想,把战争矛头首先指向社会主义苏联。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对此有一个明白的表态:“按照官方的说法,俄国是被当作敌人来看待的,但是事实上一切都是针对英国的。同时反对英国、法国和俄国是不对的,而这种做法不应重演了”^⑳。

其次,绥靖政策使纳粹德国“分而取之”、“分而治之”的手法得以顺利实施,希特勒实现了“不流血的征服”的目标。希特勒在利用英法的绥靖政策决定实行对中欧国家“不流血的征服”的过程中,面临着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一是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等其必欲征服的国家是一锅端同时吃掉,还是逐一征服。考虑到德

国自身的军事实力和战争准备状况,希特勒决定采取“打完一个再打另一个”的“分而取之”、各个击破的方法。希特勒承认,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不可采用一次行动来达到”,要逐个逐个地把它吃掉^{②1}。当然,希特勒采取行动的“确切细节和次序大概是随事态的发展进程而决定的,但就其方针的某些方面而言,希特勒是有确定看法的”^{②2}。其二是如何征服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英法的盟国而又不引致英法的武力干预。因为从当时德英两国的相对地位和军事实力来看,德国尚不具备与英国公开武装对抗的实力。在希特勒征服欧陆的过程中,每当德国的行动受到英国的真正反对并以诉诸武力相威胁时,希特勒总是做出退让。比如在慕尼黑会议前的两次英德会谈中,希特勒一次次提高要求,但每次当张伯伦表示要中止会谈,不惜兵戎相见时,希特勒总是软了下来。在慕尼黑会议期间,谈判进展一度不顺,希特勒十分恼怒,以致他在回柏林的途中还对随行的党卫队官员说:“张伯伦这家伙使我进不了布拉格,真叫我扫兴。”^{②3}在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5月危机期间,德国入侵捷克似乎已迫在眉睫,但当捷克宣布“部分动员”,特别是英国声称“德捷战争就意味着法德战争,因而也许或迟或早成为英德战争”^{②4},以及法、苏表示援助之后,希特勒又不得不退却了。虽然希特勒又在5月底下达了“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但希特勒心中很清楚,《绿色方案》实施的前提就是英法实行绥靖政策,因为德军难以抵挡法国从西部边界实行的反击,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前夕,德军西线陆军一个指挥官说过,西线德军抵挡不了法国三个星期的进攻。但是德军敢于把主要兵力放在东线,西线只留少数部队作掩护,并不开一枪就达到了目的,究其原因,正如希特勒在6月18日发给德国武装部队的指令中所说:“无论如何,我只是在坚信如同占领非军事区和奥地利时一样,法国不会出兵因而英国也不会干预,我才决定采取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②5}

在德国入侵波兰问题上也同样如此。1939年8月25日,希特勒下达作战命令后,英国和波兰结成同盟,希特勒赶快收回了已下达的进攻命令。后来希特勒查明英国没有真正支持波兰的意图,认为如果有战争的话,也是“假战争”^{②6},才接着又发出进攻命令。即便如此,希特勒还是忧心忡忡,生怕英法从西线反击。关于这一点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说得十分清楚:在进攻波兰时,“只是因为几乎调走了西线的全部兵力,才保证了我们在波兰的胜利。法国人可以越过莱茵河,而我们根本无法阻挡他们前进。他们将会威胁鲁尔区,那是德国进行这场战争的最为关键的因素。”^{②7}

“分而治之”是希特勒为实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侵占又不招致英法的军事打击而想出的对策。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则是运用各种手段,利用英法企图祸水东引、明哲保身的消极避战的绥靖主义心态,破坏离间英法与被侵略国之间的关系,使面对侵略的中小国家在受到德国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孤立无援,最终丧失抵抗意志而不得不束手投降。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先后被吞并的过程对引作出了最好的说明。希特勒在吞并奥地利前,在明知英法已决定放弃奥地利的情况下,口气强硬地对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说:“英国?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动指头,”“法国?……现在对法国来说太迟了。”奥地利不投降,德国就会出兵占领^{②8}。被英法抛弃而陷于

孤立的奥地利,只好向意大利求援,但同样又遭到拒绝,最终被德国放手宰割。对于意大利在此问题上的配合,使德国“分而治之”的手法不致落空,希特勒心存感激,他对墨索里尼说:“我已不害怕万一我们发生冲突军事上会存在的可怕处境了”,“我的确是从心底里感谢你。我将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忘记这点”²⁹。

捷克斯洛伐克同样也是德国“分而治之”离间手法的牺牲品。捷克斯洛伐克同法、苏均缔结有互助条约,按说希特勒是不敢贸然下手并达到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目的的。然而,希特勒通过对英国施加压力,由英国迫使法国放弃法捷军事条约。当捷克斯洛伐克形势恶化,希特勒一次次叫嚣“要把捷克人打得落花流水”并以不惜与英法血战到底相威胁时,张伯伦一方面在英国国内动员防空,疏散学生和儿童,腾空医院,散发大量防毒面具。伦敦满城传言,正在收集旧木板,以弥补棺材的可能不足。张伯伦的目的在于将国内气氛搞得高度紧张,引起英国上下对战争的恐惧之后,他便能以拯救人类和平、使英国免遭战火侵袭的名义,签订慕尼黑协定而不受指责,另一方面,他又给捷克总统贝奈斯发去了一封措辞强硬的迫降电报³⁰。英法甚至无耻地威吓捷克:如果不接受“元首”的要求,捷克就将构成对德的“蓄意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接着是英国,就解除对捷克承担的任何义务³¹。对此,正如威廉·夏伊勒说的:英国和法国不但抛弃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如果这个国家拒绝慕尼黑条件的話,英法还将支持希特勒使用武力³²。至于苏联,虽然它也与捷克订立了互助条约,并在危机发生时多次表示愿意承担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但是由于苏捷条约订立时,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一个只有当法国按照法苏条约,或者按照法捷条约对苏捷两国履行其义务时,苏捷互助条约才有效,而法捷条约长期没有得到法国议会的批准,苏捷条约也就等于废纸一张了。这样,到 1938 年 9 月 29 日,随着“慕尼黑协定”的出笼,德国不费一兵一卒,就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 11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和 360 万人口,次年 3 月,希特勒更进一步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对于希特勒德国利用离间手法和策略成功实施“分而治之”的做法,曾担任 1947—1949 年审判德国外交罪犯的美国起诉人 T·泰勒将军一针见血地指出: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是由纳粹外交人员“按照希特勒外交政策分而治之的根本原则”侵占的,“在每一次侵略之前,被告(德国外交罪犯——引者)展开疯狂的活动,以便依靠外交手段使被侵略国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³³。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过程中,象冯·威兹萨克这些外交头目“使用外交压力破坏捷克斯洛伐克和其英法盟国的关系,使捷克像奥地利一样在德国威力高压下陷于孤立。”³⁴

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在英法绥靖政策的掩护下进行战争准备,不致于过早地在世人面前暴露其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尽管在其为全面大战扫清障碍的行动中,纳粹德国的底牌是“如果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那就诉诸武力”³⁵,但希特勒仍然命令其部队或第 5 纵队尽可能采取英法所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军事占领或对被侵略国家施加压力。例如,在入侵奥地利的前一天,希特勒发布命令指出:“出兵要造成我们不是有意同我们奥地利兄弟打仗的印象。从我们的利益着想,一切兼并活动都不要使用武力,而是采取在居民欢迎下开进的和平方式。因此,要避免任何冲

突。”^{③⑥}同样,在占领捷克斯台德区的问题上,希特勒又故伎重演并再次奏效。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对此形象地说明:对于捷克问题不能操之过急,要逐步创造条件;在条件成熟前不要轻举妄动,“英法都不愿为捷克斯洛伐克去找麻烦。”可以相信,如果捷克不受到“任何直接的外来干涉”,而是逐步自行解体的话,英法“两国会使捷克斯洛伐克听任命运的摆布”;“如果这个行动不是匆促完成,反正不会引起协约国迅速的反应”。“我们要避开巨大的危险,而使事情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③⑦}

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纳粹德国便如愿以偿地完成了从奥地利到波兰的为发动世界大战扫清障碍的工作,而这些侵略行动都是在德国的战争准备远未完成,其军事、经济实力远不如英、法等欧洲强国的情况下进行的。出现这样不正常的现象,原因只能归结到英法推行的损人利己的绥靖政策。绥靖政策的纵容不仅使得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人民饱受纳粹铁蹄的践踏和蹂躏,更为严重的是,它被希特勒用来成功地增强了德国的战略地位,同时也刺激了其扩张欲望和野心,增强了其称霸的信心和实力,最终加速了纳粹德国战争准备的进程而使其提前发动全面战争成为可能。因此,我们说,绥靖政策对希特勒提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了加速和催化的作用。

二、反德国际统一战线的流产,形成了对纳粹德国十分有利而又难得的战机

德国地处中欧,在具有联盟性的世界大战中,它的最大弱点是可能在两线面对强敌的共同夹击而导致失败。

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德国最反动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夺取全欧和世界霸权,一方面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为敌,另一方面又以社会主义的苏联为敌。这样,希特勒集团就把德国置于东西两面受敌的地位。两面都是强敌,哪一方都不可轻视。在这种形势下,如何避免两线作战的问题,在希特勒对外扩张的总战略中就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希特勒早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就认为:“日尔曼民族要想结束其在欧洲面临被消灭的威胁这种局面,它就绝不应该重犯战前时期四面树敌的错误,而必须确定谁是最危险的敌人,以便集中力量打击它。”^{③⑧}希特勒上台后,也确是按这个方针行事的。对于希特勒来讲,在二战全面打响之前,他所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就是避免两线作战,具体来讲就是要尽一切可能破坏国际上主要是英法苏等国组成反对德国的统一战线,这一目标如不能实现,纳粹德国定将陷入灭顶之灾。换言之,德国何时能发动世界大战的重要前提,就是看德国什么时候能使正在酝酿中的国际反德统一战线流产。对此,丘吉尔曾这样评说:“英、法、苏三国的联盟一定会使1939年的德国大为惶恐不安。即使在那个时候,谁也不能肯定战争就一定不能避免”。“同盟国方面还可以运用优势力量采取第二个步骤。它们可以在外交上重新把主动权夺回来。希特勒一方面经不起发动他曾极力反对的东西两线同时进行的战争,另一方面又不能半途而止。那时我们没有使他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说起来实在可惜。”^{③⑨}希特勒在一举消灭波兰之后,曾满心欢喜地对他的高级将领们称:“六十七年来我们第一次避免

了两线作战。自从1870年以来,我们一直渴望做到而又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今终于实现了。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只须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另一条战线目前安然无事。”^⑩希特勒避免两线作战得逞后的这种喜悦心情,也从反面说明了他是多么害怕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德国的主要目标是力图使1939年进行的英法苏三国莫斯科军事谈判流产,使三国无法结成反对德国的统一战线。德国驻英大使狄克逊曾一语道破了当时纳粹德国处在危急关头的那种惴惴不安、如坐针毡的心情。他说:“英方包围政策(指莫斯科英法苏三方所要结成的反对德国的国际统一战线——引者)对于德国的危险是全体德国人所知道的;德国人民坚决一致准备消除这一危险。”^⑪

1939年的英法苏三国莫斯科军事谈判起源于英法苏三国政治谈判,它是战前年代外交政治斗争的最后一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的成功将可以大大推迟或延缓二战的爆发。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善良的人们的愿望为转移,这一谈判最终以失败流产而告结束,此后不久,二战便全面爆发。

英法苏三国在莫斯科进行的这一事关重大的谈判终归失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作为谈判重要一方的英法拒不放弃其反共反苏的立场,在世界正迅速滑向大战边缘的危急时刻,仍然对谈判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毫无诚意可言,以致谈判最后破裂。英法是谈判的主角之一,但以张伯伦为代表的英国保守党当权集团,一贯把社会主义苏联视若洪水猛兽,长期实行敌视和孤立苏联的政策,极力把苏联排斥在欧洲事务之外。张伯伦本人则更是对苏联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偏见和敌视。他上台后就叫嚷“俄国是英国的敌人”^⑫,“俄国是一个极其不可信赖的朋友……它对别国具有一种巨大的、令人不快力量”,“俄国是在玩弄权力政治而非寻求和平”^⑬。即使到了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定,吞并了整个捷克并对英国霸权利益构成重大威胁之时,英统治集团中相当一部分人仍然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危害远甚于纳粹主义,把苏联的集体安全主张看成是企图在欧洲扩张,看成是想借此“推翻资本主义”。张伯伦在其日记中写道:“我必须承认对俄国极不信任。在我看来,这些动机与我们的自由思想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它只关心把别人搞得面面相觑”^⑭。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张伯伦仅把与苏联的谈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力图把苏联推到抗德第一线作为英国的盾牌,或者,至少能借英苏法谈判拖延时间,延缓希特勒对西方战争的发动。张伯伦政府并不愿和苏联建立明确的、牢固的军事同盟,他的“政治判断使他怀疑俄国保卫共同事业的意愿。其次,他的顾问们提供给他的一贯都是对俄国这样做的军事能力的过低估计”。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卡多根给内阁的报告中指出,和苏联的谈判,“与其说是为了获得任何实际的军事利益,不如说是为了安抚我们英国的左翼”^⑮。英国驻苏大使西兹则更加直言不讳:“我对军事谈判的成功不表乐观,我也不认为军事谈判能迅速结束。现在开始谈判,将给轴心国家一种有益的震动,也可以给我们的友邦一种刺激,而且这样的谈判可能延长到足以避过今后几个危险的月份”^⑯。显然,在英国政府眼里,莫斯科军事谈判只是一种应景的需要,一种工具,英国政府需要的只是这个

过程,并不期望它产生什么具有实际意义的结果,要利用它尽可能推迟战火烧到英国的时间。正如英国谈判代表伯纳特所说:“如果我们不能使对方同意签订条约的话,我认为政府的政策就是把谈判尽可能延长。”^[47]

英国谈判代表在莫斯科军事谈判全过程的表现,也足以说明其政府的上述两面派行为和矛盾心理。一是英国对于这样重大的谈判派出的只是一个级别很低的外交部东欧司司长斯特朗以及已列入退役名单的海军上将德拉克斯,代表团成员谈判时甚至没有正式的书面的全权证书。在时间紧迫之际,英代表团竟故意乘坐航速每小时不到10海里的低速邮船而不坐飞机,以致耗时6天才到达莫斯科;二是对谈判毫无准备,谈判开始时英国代表团团长德拉克斯就承认,英国“没有一个确切的计划”,也没有和法国代表团事先协调磋商过;三是英国政府给其代表团团长、海军上将德拉克斯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不列颠政府不愿意卷入任何明确规定的、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限制我们行动的义务。因此,至于军事协定问题,应力求尽可能地限于比较一般地规定”^[48]。换言之,英国根本不打算承担任何实际的义务,不打算进行认真的谈判。英国当局甚至给代表团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让代表团去调查苏联的军事情况。

至于法国,其外交在慕尼黑之后已丧失了主动性而沦为英国的小伙伴,使它宁愿唯英国马首是瞻,去和德、意打交道,在纵容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不愿和苏联缔结正式、有效的同盟。法国外长庞纳公开声称:“法国政府对俄国向小国提供全盘担保的想法不热心”^[49]。法军总参谋部给法国军事代表团的指示是“同俄国的合作被看作辅助因素”^[50]。法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博弗尔承认,法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军事谈判期间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找到一种能够继续谈判的借口”^[51]。显然,法国对莫斯科军事谈判也同样持拖延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正是由于英法政府在莫斯科军事谈判中基于反共和“祸水东引”目的而采取的拖宕、回避的短视政策,使得双方在谈判的一系列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和障碍,并直接为纳粹德国的从中破坏、挑拨离间提供了可乘之机,最后,苏联不得不宣布无限期休会,从而关上了制止战争的又一扇大门。

1939年英法苏莫斯科军事谈判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德国的从中破坏、挑拨离间。德国对英法苏三国军事谈判可以说是既怕又恨,德军将领认为:“如果德国与西方列强交战之外还必须同俄国打仗,就简直没有打赢的机会。”^[52]里宾特洛甫也一再告诫希特勒:“在你发现英国把俄国当作盟国之前,你无须担心英国。只有在它们结盟时才意味着它真正要打仗了”^[53]。于是,希特勒决定利用德国正在同苏联、英国同时进行秘密谈判的有利条件来击破英法苏可能的联合。一方面对于英国,德国是又打又拉。德国“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是按如下两方面来影响英国领导人:首先是警告他们要反对那种包围阵线政策,其次就是提出合作协调的建议。”^[54]德国谈判代表狄克逊等人在同英国代表威尔逊的谈判中,指责英国是在执行一条对德国的“包围政策”。很快,英国的绥靖主义者对德国的压力感到了不安,在德国主动提出“合作协调的建议”的诱惑下,“英国答应停止其在现今与苏联进行的关于缔结公约的谈判”^[55],“实行放弃建立包围阵线的排斥政策而力求与德国进行谈判的方法来同德国达成协

定。”^{⑤4}显然,德国的外交离间行动可谓一石三鸟,不仅鼓励了英国政府在莫斯科三国军事谈判中采取了一种消极拖宕的态度,而且极大地增添了苏联对英国的不信任,并为德苏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德国在与各大国的外交中处于游刃有余的有利地位。

德国在同英国进行秘密谈判的同时,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并放手攻打波兰,德国一改过去反共打意识形态牌的做法,决定对苏联在谈判中所提的要求作出重大让步。应该说,德国双管齐下、软硬兼施的外交攻势在对苏外交上也同样成效显著,实现了其预期的破坏英苏关系,使苏联在德国与西方可能的战争中承诺保持中立的目的。在英法苏三国军事谈判的酝酿阶段,德国外交部官员、德苏经济谈判代表施努雷,就奉命邀请苏联驻德国代办阿斯塔霍夫和商务代表巴巴林共进晚餐,施努雷向两位苏联外交官表示:“莫斯科应该考虑到这一点。英国能够给俄国什么呢?至多是参加一场欧洲战争并与德国交战,这对俄国来说几乎不是一个值得向往的目标。相反,我们能够给些什么呢?中立,并置身于可能发生的欧洲冲突之外,如果莫斯科愿意,还可以达成一项关于俄德之间相互利益的谅解,这项谅解会像先前那样给双方带来好处”^{⑤5}。在三国军事谈判即将开始的前夕,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又直言不讳地对苏联表示:“如果你们另有打算,例如,如果你们认为调整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最好方法是邀请英法军事人员前往莫斯科,这当然是你们的事。至于我们,我们毫不去理睬所谓西欧民主阵营对我们的叫嚣。我们足够强大,对他们的威胁只是嗤之以鼻。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打不赢的战争是没有的”^{⑤6}。德国果断的外交行动与张伯伦拖拉犹豫、斤斤计较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使苏联从自身安全考虑出发对英国失去了耐心和信心,其立场逐渐偏向德国一边。德国的离间政策获得了成功,它利用并扩大了苏联对英法的不信任以及亟于避免卷入战争的思想,以在局部问题上作出让步为代价,终于将正在靠拢的英国同苏联拉开,并最终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德国下一步发动全面战争解除了后顾之忧,扫清了巨大的障碍,从而形成了对德国十分有利而又难得的战机。

英法苏三国军事谈判的失败标志着苏联力图建立的集体安全政策走到了尽头,纳粹德国力图使反德国际统一战线流产的图谋终于得逞,制止或迟缓侵略战争的最后一道栅栏已被打开,同时,希特勒的战争准备也顺利地提前走完了最关键的一步,战争提前打响对纳粹德国来说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

三、在战争准备上,出现了促使和刺激纳粹德国提前发动战争的顺利进展和有利态势

如果说英法的绥靖政策和国际反德统一战线最终流产是在外部形成了对德有利的战机和条件的话,那么德国的国内战争准备取得顺利进展和周边战略态势的改善,则是德国提前发动战争的另一重要因素,加上德国在前期清除战争障碍中已取得的重大进展,使德国在战略形势等方面处于一定优势的地位,原本不利的地缘战略态势

也发生了重大改观,多种原来不利的内外因素也都因为英法绥靖政策的实施和希特勒德国的军事侵占、外交欺骗而得到重大改善。对于希特勒而言,提前发动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已经不需要也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首先,德国的战略形势得到极大改观,处于前所未有的有利地位。一是波兰已成为德国的囊中之物,英法这两个德国主要敌人在欧洲大陆的主要盟国即将被全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被全部吞并对德国的意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此波兰处于德国的两面夹击之下,而且波兰的工业中心距离德国的空军基地仅有 25 分钟的航程,因此,德军统帅部的约德尔说,占领了捷克,使得德国“可以在多少有利的战略前提下考虑波兰问题”^⑤。二是德意军事同盟的建立,纳粹德国“寻找战友”、建立法西斯轴心集团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1938 年慕尼黑会议期间,希特勒曾向墨索里尼提出参加德日军事同盟的问题,墨索里尼当时原则上表示同意^⑥。同年 10 月下旬,里宾特洛甫访意时,向墨索里尼等人提出:“目前,结盟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有益而深谋远虑的步骤”,“一旦战争爆发,意大利和德国可以将 200 个师投入战场,这些部队在领袖和元首的指挥下会具有双倍的战斗力”。墨索里尼尚未拿定主意,便表示“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单纯防御性的同盟,这种同盟没有任何必要……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目的在于改变世界地图的同盟”^⑦。直到 1939 年元旦,墨索里尼的态度才发生转变。希望在元月下旬同德国签约,因为“他认为同西方民主国家发生冲突越来越不可避免,因而希望先期在军事上实现结盟”^⑧。1939 年 4 月中旬和 5 月初,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先后访意,在同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会谈后,双方决定“用一项政治和军事的条约把两个轴心国家的关系以明确的形式规定下来”^⑨。这样,5 月 22 日,德意订立了军事同盟,即所谓的“钢铁公约”。公约规定缔约双方将互相援助以取得他们的“生存空间”,显而易见,这个公约带有十分露骨的侵略性质,它是德意勾结、发动世界大战的重要步骤。它不仅针对苏联,而且也针对英法。另外,德军在这期间对阿尔巴尼亚等国的侵占,改善并增强了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战略地位,使这个地区成为希特勒建立的,从大西洋起,经过西班牙,横贯意法和德法边界,连接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对英法作战进攻战线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三是德意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建立起了由佛朗哥控制的法西斯政权。对德国而言,通过这一事件获得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利益。第一,从战略上威胁英法在欧洲的侧翼并形成对英法的包围,切断了其同北非和亚洲这些海外殖民地的传统联系以及它们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海上运输线,并使法国腹背受敌。同时,德国还可以利用西班牙同拉美国家的传统特殊关系,取得向拉美扩张的优势地位。第二,经济上掠夺西班牙大量资源,增强其扩张实力。西班牙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原料产地,战略性资源较为丰富,它出产的汞占世界开采量的 45%,黄铁矿占世界开采量的 50% 以上,此外,它还大量出口铁矿、钨、铝、锌、钾、银和军事工业必需的其它矿物。德国通过支持佛朗哥叛乱,与佛朗哥一起在西班牙建立了“希斯马”等一大批专业股份公司,德国利用“希斯马”公司仅在 1936 年 10 月之后的一个月里,就把 10750 吨锰、钨、铜与其它贵金属运往德国^⑩。而在 1937 年,它又运给德国 162 万吨铁矿、92 万 6 千吨黄金矿和 7 千吨其它

矿物⁶⁵。第三, 离间意与英法的关系, 促其投向德国的怀抱。西班牙内战为希特勒进行战争准备“寻找战友”提供了良机。西班牙内战对希特勒德国的特殊意义, 正如德国驻罗马大使哈塞尔在 1936 年 12 月的报告中所指出的: “在意大利跟法国和英国的关系, 西班牙冲突所起的作用可以跟阿比西尼亚冲突相比, 即清楚地暴露了这些国家的对立的实际利益, 从而防止了意大利为西方国家所拉拢并为它们所利用。争夺西班牙政治统治势力这一斗争, 暴露出意大利和法国固有的对立; 同时意大利在地中海西部的强国地位又跟英国的地位发生了竞争。意大利只有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同德国并肩对付西方国家是得策的。”⁶⁶希特勒紧紧抓住了这一拉拢意大利的难得时机, 派出德国谍报局头子卡那里斯“同意大利情报工作头子罗阿塔将军共同制定了法西斯意大利参与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计划。墨索里尼接受了这一计划”⁶⁷。武装干涉西班牙, 标志着德意法西斯勾结的全面开始。

其次, 德国国内的扩军备战活动进展到了重要的转折关头。希特勒十分清楚, 要对外扩张, 必须先稳住阵脚, 巩固其对国内政权的控制, 恢复和发展经济, 尽快重整军备, 并使经济逐步纳入战争经济轨道。为此, 希特勒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为发动侵略战争扫清障碍的措施并取得成效, 最终使其提前发动战争成为可能, 奠定了基础。一是全力掌控警察机构。二是通过党卫队强化对外交等核心部门的控制。党卫队分子的大量进入外交部, 为希特勒推行民族侵略主义政策和对外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希特勒历来重视德国的国防军建设。1936 年 8 月 26 日, 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说: “我们在军事上使用力量的规模和速度必须是最大限度的。……如果我们不能在最短时间内, 从战斗训练、兵团数量、武器装备以及首先是精神素养方面, 把德国军队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话, 那么德国就将毁灭”⁶⁸。因此, 高速度扩建一支庞大的富于攻击精神和高度机动性的侵略军, 是纳粹德国的一个重要建军原则。四是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据统计, 到 1938 年, 德国的钢铁产量已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总和, 主要军事物资——铝的产量为英法两国总和的 2 倍多。丘吉尔也说过: “在战争爆发前的这一年里, 德国的军火生产的总产量可能比英法两国合起来的产量最少超过 1 倍, 或可能超过 2 倍”。需要指出的是, 德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很重要的部分是来源于对国内人民的搜刮和掠夺。从希特勒上台之日起, 纳粹德国就通过国家预算, 发行公债, 没收犹太人的财产等名目榨取人民的血汗钱, 甚至残废军人抚恤金和职工保险费的基金也有 100 亿马克被无理克扣。据统计, 1933—1939 年间, 德国国民收入总额共计 3801 亿马克, 而同一时期, 希特勒政权从人民身上就榨取了 1502 亿马克, 占国民收入总额的 39%。德国的军费开支十分庞大, 1933—1939 年间, 德国的军费总开支共计 900 亿马克, 占同期国家支出总额的 60% 以上⁶⁹。正是由于纳粹德国在 6 年半的疯狂扩军备战中, 消耗掉了全部资金, 黄金外汇极其短缺, 国家债务超过 600 亿马克, 使德国经济再也难以支撑, 希特勒为此警告说, 德国的经济状况不好, 唯一出路, 就是发动战争。在进攻波兰前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上, 希特勒在讲到发动这次战争的“理由”时说: 经济情况“迫使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必须行动”⁷⁰。显然, 为了逃避经济崩溃的结局, 纳粹德国已决心提前发动第

二次世界大战。

第三,德国的整体实力因其前期的侵略已具有一定的优势。

德通过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极大地增强了其经济军事实力。据统计,由于兼并了奥、捷两国,德国的劳动力增加了 17.9%,铁产量增加了 34.6%,钢产量增加了 11.6%,电力增加了 10%,赛璐珞增加了 4.2%,水泥增加了 13.5%,石油增加了 11.3%,铁矿石增加了 1/3,锰矿石增加了 1/4,并且还占有了产量占全欧产量 1/4 的捷克锑矿。另外,德国还从两国掠夺了价值 1.05 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其中仅奥地利就被抢运走了约值 4 亿 5 千万先令的黄金和外汇^①。在军事方面,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其军事实力得到很大增强。一是兵员数量大增,共获得了捷克 45 个师(一说 35 个师)的陆军^②。法国驻捷克军事代表团团长福舍将军对这支部队的评价是,“优良的士兵,优良的军官团,优良的装备”^③;二是战略形势更加有利。捷克的降服,使德国再也不需使用必须大于 45 个师的部队去征服它而冒可能损兵折将的巨大风险,也用不着再在德捷边境布署大量的部队而影响其它重要方向的兵力布署,并且利用捷克军队同德军一起可对德国的下一个目标波兰进行夹击,这在增加波兰防御难度和心理压力的同时,又明显减少了德国攻克波兰的困难;三是捷克技术先进,其巨大的军工生产能力与德的巨大的军工生产能力结合在一起,大大加快了德国国内的战争准备进程。仅以捷克的斯科达兵工厂为例,它是仅次于德国克虏伯的欧洲第二大兵工厂,该厂于 1938 年 8 月至 1939 年 9 月生产的武器,几乎等于同期英国各兵工厂产量之和;四是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技术装备。捷克作为欧洲大陆排名第 5 位的军事强国,其所拥有的全部武器装备,几乎是完整无损地全部被德国接收。

总之,随着对德国极为有利的外交、经济、军事形势的相继出现,希特勒再也难捺其发动世界大战的野心,他已无法接受继续等待的事实,他认为“所有这些有利的形势再过二、三年就要消失”,“现在比二、三年后更为有利”。他叫嚷道:“现在还来得及,西方不会干预。我们必须以不可动摇的决心冒险一击。政治领导人要象军事统帅一样实行冒险。摆在我们面前严肃的抉择是:不是出击,就是迟早必定被消灭”^④。于是,希特勒决定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利用已经取得的暂时优势,以果断的行动发动战争。1939 年 9 月 1 日,德军实施对波兰进行攻击的“白色方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提前全面爆发。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P·A·鲁登科主编:《纽伦堡德国主要战犯审判案(文件汇编,3 卷集)》第 1 卷,莫斯科 1965 年版,第 123—133 页第 132—133 页、第 246 页、第 250 页。

④⑤《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2 页、第 50 页。

⑥⑦⑧张继平:《历史的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与政略》,时事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92 页、第 286 页。

⑥⑦⑧布·缪勒·吉列勃兰特:《1933—1945 年的德国陆军》第 1 卷,莫斯科 1956 年版,第 32—33 页、第 161 页、第 26 页。

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U·达契切夫:《德国法西斯战略的破产——简史、文件和资料》第 1 卷,莫斯科 1973 年

版,第 210 页、第 134—135 页、第 139 页、第 106 页、第 482 页、第 303 页、第 138 页。

⑩路易斯·L·斯尼德:《第三帝国百科全书》(Louis L. Snyder, "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 纽约 1976 年版,第 300 页。

⑪⑫E·M·罗伯逊:《希特勒的战前政策和军事计划》伦敦 1963 年版,第 97 页、第 190 页。

⑬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第 1 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48 年中文版,第 18 页、第 31 页。

⑮⑯⑰尼维尔·汉德逊:《一项失败的使命》纽约 1940 年版,第 96 页、第 96 页、第 191 页。

⑱格哈特·L·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39》(Gerhard L.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Starting World War II, 1937—1939") 芝加哥大学 1980 年版,第 657 页。

⑲约翰·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John W. Wheeler—Bennett, "Munich—Prologue to Tragedy") 纽约 1962 年版,第 56 页。

⑳㉑㉒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 7—1939. 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6 号文件、第 538 页、第 309 号文件。

㉓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纽约 1973 年版,第 84—85 页。

㉔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纽约西门—舒斯特公司 1960 年版,第 327 页、第 343 页。

㉕《国际关系史论文集》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 1984 年 12 月,第 271 页。

㉖㉗㉘约翰·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北京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56 页、第 419 页、第 423 页、第 410 页。

㉙㉚㉛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三联出版社,第 504—505 页、第 419 页、第 736—737 页。

㉜㉝㉞P·A·鲁登科主编:《纽伦堡德国主要战犯审判案(7 卷集)》第 2 卷,莫斯科 1957 年版,第 45 页、第 360 页、第 360 页。

㉟希特勒:《我的奋斗》(Hitler, "Mein Kampf") 美国 1939 年版,第 917 页。

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1 卷,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1) 伦敦 1972 年版,第 325—326 页。

㊲B·A·雅各布森、L·史密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和战略》(文件汇编) ("World War II, Policy and Strategy") 美国 1979 年版,第 42 页。

㊳《世界现代史论文集》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397 页。

㊴㊵㊶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第 2 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48 年中文版,第 179 页、第 178 页、第 112 页、第 185 页。

㊸基思·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90 页。

㊹基思·法伊林:《张伯伦传》伦敦 1979 年版,第 403 页。

㊺《二战史通讯》1981 年第 1 期,第 14 页。

㊻㊼㊽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大战前夕,1939 年》牛津 1958 年版,第 482 页、第 482 页、第 268 页。

㊾列·库达科夫:《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00 页。

㊿㉀㉁T·A·德波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 2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39 页、第 474 页、第 33 页注 2、第 28 页。

㉂《近现代史》1981 年第 4 期,第 52 页。

㉃㉄西·尤·维戈兹基等:《外交史》第 3 卷,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009 页、第 634 页。

㉅马尔康姆·莫格里奇编:《齐亚诺外交文件》伦敦 1948 年版,第 242—246 页。

㉆加莱阿佐·齐亚诺:《齐亚诺日记,1939—1943 年》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49 页。

㉇阿诺德·汤因比主编:《希特勒的欧洲》(上)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30 页。

㉈㉉里普卡:《慕尼黑前前后后》伦敦 1939 年版,第 297 页及注 1、第 296 页。